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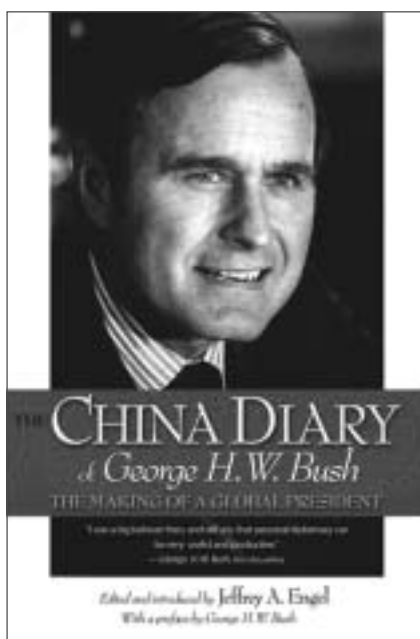
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長在這個年代，它給了我巨大的衝擊，也給了我動力和人生的坐標，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注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於是，就在這喧嘩、實利主義的90年代，守着某種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陳詞濫

調的所謂「知識份子的責任」等，開始摸索着觀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頁391)

這也正是我們這些後學重訪和超越革命年代的最值得借鑒的態度與途徑之一，而《革命年代》一書則更是直接給了我們一個重溫與反省中國革命的極佳機會。

老布什的中國日記

● 夏亞峰



Jeffrey A. Engel, ed.,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從1974年10月到1975年12月，老布什 (George H. W. Bush，以下簡稱布什) 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美國德克薩斯農業和機械大學 (Texas A & M University) 布什政府與公共服務學院 (Bush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 恩格爾 (Jeffrey A. Engel) 教授將布什在中國任職期間的日記整理、編輯成《布什的中國日記：一個有全球視野和影響力的總統的誕生》(*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一書，於200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引用只註頁碼)。恩格爾將全書根據時間順序分為八章，每章有一個主題，並配有導讀和詳細註釋。恩格爾為全書撰寫了前言和一篇詳細論述布什赴中國前的政治外交經歷，以及中國之行對其以後政治生涯影響的專題文章，布什親自

布什的中國日記只是為他個人留下記錄，沒打算公布於世。所以才能真實反映布什對中國領導人的看法、對美國政治與外交的個人見解、他本人的外交風格以及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外交官在中國北京的生活情況。

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布什希望通過他的努力，改善中美關係的現狀。他給美國國務院寫報告，建議增加聯絡處工作人員的編制、擴大聯絡處的規模和職能，以顯示中美關係向前發展的跡象。

為本書作序。全書配有一組布什在中國期間的工作和生活照片。

與很多人的日記不同的是，布什的中國日記，最初並沒有記錄在本子上，而是錄在磁帶裏，多年後由他的助理整理成文字。他沒有每天記日記，有時是將一周大事錄一遍。事實上，日記從1974年10月21日始到1975年8月22日止，他在中國的最後四個月沒有記日記。布什記日記，主要是為了回顧他在一天中所應付和處理的事務，理清思路，為他個人留下記錄，沒打算公布於世。也正因為如此，布什的中國日記才能真實反映他對中國領導人的看法、對美國政治與外交的個人見解、他本人的外交風格以及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外交官在中國北京的生活情況。本書將成為研究1970年代中美關係和美國第四十一任總統的一份重要歷史資料。布什在日記中還談到對當年北京生活的感受，涉及他對中國的食品、風景、氣味和聲音的評介和印象，有很多十分生動精彩的片段。日記語言簡練易懂、可讀性很強。因此，本書也將受到一般讀者的喜愛。

布什赴中國之前，曾任美國國會眾議員、駐聯合國大使、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是共和黨中有影響力的人物。1974年8月，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因為水門事件辭去總統職務。福特 (Gerald R. Ford) 繼任總統後，一度考慮任命布什為副總統，但因在水門事件發生後，作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布什曾為尼克松辯解，任命布什為副總統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福特最終任命洛克菲勒 (Nelson A.

Rockefeller) 為副總統。為安撫布什，福特總統有意派他到美國最重要的對外使館——英國或法國當大使。但是布什選擇前往中國，因為他認為中國「是個令人神往的地方」。他對福特總統說，去中國當聯絡處主任這個工作很重要(頁5)。

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布什希望做出一番事業，通過他的努力，改善中美關係的現狀。但是，當時中美關係十分脆弱敏感，國務卿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本人親自控制對華政策。布什到北京任職後，遠離美國國務院的控制，基辛格和國務院官員很擔心他不聽指示——中美關係在近期不可能得到改善，美國駐北京聯絡處需要低調行事。與前任聯絡處主任布魯斯 (David Bruce) 不同，布什與基辛格的個人關係很一般，他對基辛格想控制他在北京的行動很不滿意。由於布什在共和黨內的地位高、與福特總統關係密切，基辛格對布什的很多做法也只能容忍。布什的中國日記多處記錄了他對被基辛格排除在對華政策的決策圈外很惱火。基辛格和國務院對布什發回的大量外交電報置之不理。布什儘管心儀基辛格的個人才華，但他在日記中也批評基辛格辦外交過於感情用事，而且極度秘而不宣，對手下人態度很壞，這一切使布什十分不滿。

布什的前任——布魯斯大使是享有盛譽的職業外交官，曾分別擔任美國駐歐洲三大國——英、法、德大使，至今也只有他一人享有此殊榮。布魯斯善於處理錯綜複雜的國際問題，但對聯絡處內部的管理

顯得很超脫。鑒於中美關係的微妙狀況，布魯斯要求駐北京的美國外交官低調行事。布什到任不久，便着力改變布魯斯的一些做法。當他得知不少聯絡處官員從沒有機會參加在聯絡處主任住處舉辦的活動時，便很快邀請他們到他住處來參加活動。他還着力提昇聯絡處在北京外交圈的影響。他到任後的第一周，就指示手下的外交官，今後要出席在京的其他外交使團的國慶日慶典活動。他給美國國務院寫報告，建議增加聯絡處工作人員的編制、擴大聯絡處的規模和職能，以顯示中美關係向前發展的迹象。在1974年11月1日與中國當時主管外事的副總理鄧小平第一次會晤後，布什當天的日記中是這樣記錄的：「我和他談了我的觀點，表示在我們的中國政策方面必須有明顯進步的迹象。」(頁47) 布什認為這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重要的一步。

體育一直是布什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布什就任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消息公布之後，英國駐美大使拉姆斯波塞姆(Peter Ramsbotham)曾說過：「美國聯絡處很可能將舉辦一個接一個的網球錦標賽。」(頁438) 中國日記記載了布什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參與的一場又一場網球賽。布什認為，「體育能使人真正感到平等。」(頁279) 他堅信，「體育能使人逾越政治分野。」(頁131) 為了了解中國人的性格，布什在日記中詳細記敘了他的網球球友表現。幾位中國球友力爭贏得比賽的情況，在他看來，宣揚平均主義的中國並沒有完全消除個人榮譽感。布什在1975年5月還記載到：「訪華的美國田徑隊在北京體育館大獲全

勝，使我感到極為驕傲。」美國駐北京聯絡處工作人員稱，這是美國力量的極好表現(頁297)。基於布什把體育作為國際交往和理解的重要渠道，他以美國奧運代表團名譽團長的身份出席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當之無愧的。

布什對到中國任職充滿信心，他的中國日記第一篇(1974年10月21日)記載到：「我希望能見到下一代的中國領導人，不管他們是誰。」(頁6) 他很希望通過個人化外交，改變中美交往的氛圍。個人化外交成為布什後來辦外交的最主要特徵。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卻認為，二十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的緩和，基礎是出於中美地緣政治利益需要，雙方共同對付蘇聯人。他們不指望幾個在北京的美國外交官、記者和商人，能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的個人關係，從而使中美關係升溫。他們也不指望共產黨中國，在輿論宣傳方面能和緩對美國的批評和指責。

中國日記中一個不斷出現的話題是布什對中國對外宣傳中繼續充滿激進的革命口號和反美言論的不滿。布什希望用他自身的言行來告訴中國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美國人不是帝國主義者，美國人並不是要佔領全世界，美國人也並不是都很富有」(頁185)。儘管他本人出生世家、接受的是美國常青藤(Ivy League)名校的教育，但他希望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樸實、尋常、平易近人的美國人。他覺得，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北京過平民的生活。因此，他和夫人芭芭拉(Barbara Bush)買了自行車，經常騎車外出，而不是坐聯絡處的豪華轎

中國日記中一個不斷出現的話題是布什對中國對外宣傳中繼續充滿激進的革命口號和反美言論的不滿。布什希望用自身的言行來告訴中國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美國人不是帝國主義者，並不是要佔領全世界。

布什的中國經歷，對他的世界觀和他後來任總統時的所作所為有着深遠的影響。他更加相信個人化外交的重要性、對帶有刺激性和華麗的政治詞藻更為敏感和謹慎、加深了對多米諾(骨牌)理論的理解，堅信擊敗獨裁政權侵略的必要性。

車。他在中國學習中文，還打起了乒乓球。在北京旅遊景點遊覽時，布什會用自己的快速成像的相機為普通的中國遊客照相，並贈送給他們。儘管有些美國外交官對布什的做法頗有微辭，但他本人認為，「中國人願意看到的美國大使不是一個架子十足的傢伙。」(頁158)

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外交上的大小事情，一概由最高層控制。布什在中國任職期間，由於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進入生命的最後兩年，中國高層的政治鬥爭非常複雜和微妙。美國聯絡處在北京的活動受到中國官方的很多限制，比如說，聯絡處有事只能與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司長林平聯繫，不能主動與其他中國官員交往。外交部官員在與布什的交往中謹行慎言，不願多談中美關係中的實質問題。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布什推動中美關係發展的計劃，是難以實現的。到1975年中期，布什對中國最初的熱度降溫。這主要是由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對中國官方輿論的反美宣傳極為反感；另一方面，他為自己不能與中國官員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感到十分沮喪。他在1975年7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到：「這裏的人很友好，但反應又是如此遲鈍。他們會故意疏遠你，〔我〕很少能有機會與他們交往……我可以與副外長王海容會面一個小時，但她絕對甚麼也不說。」(頁353)他感到想見的人見不到，想談的事情找不到管事的人談。

恩格爾認為，布什的中國經歷，對他的世界觀和他後來任總統時的所作所為有着深遠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中國經驗使

得布什更加相信個人化外交的重要性、對帶有刺激性和華麗的政治詞藻 (political rhetoric) 更為敏感和謹慎、加深了他對多米諾(骨牌)理論 (Domino theory, 指一國崩潰其他鄰國就會相繼垮台的政治局面) 的理解，堅信擊敗獨裁政權侵略的必要性。在布什擔任總統的四年 (1989-1993) 中，國際舞台上風雲變幻。他應對幾個重大國際危機——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海灣戰爭、1989年中國的天安門事件等等的做法，都與他的中國經歷有關 (頁452)。

布什在中國的經歷，使他堅信個人化外交的重要性。他認為，在外交危機出現時，如果他面對的對手是他曾經交往過的，不管是在網球場、宴會上或是一起看過電影，事情就會好辦一些。擔任美國總統後，布什會時常打電話給各國領導人，並不是因為發生了甚麼事，而只是想加深對他們的了解。當危機真的出現時，這些領導人接到布什的電話，就知道他是一個可以交談和信任的人，因為在這之前，他對他們表示過關心。

在1989年中國天安門事件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的布什試圖盡早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電話聯繫，表明他對此事的嚴重關注。布什與鄧小平從1974年起就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但這一次他的努力失敗了。布什隨後親自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鄧收下信後，同意布什派特使赴中國闡明美國的立場。布什很快派出國家安全顧問斯克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 為特使，秘密前往中國。布什並不指望他與中國領導人的私人關係可能阻止中國政府動用武力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

示威者，但他認為，這種個人關係幫助化解了隨後出現的中美關係嚴重危機。布什認為，正是因為他認識和了解中國領導人，他才會在「六四」事件之後，盡他最大的努力，來維繫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頁460）。

布什在中國的經歷，使他從內心認識到，不是所有其他國家的人都像美國人那樣看問題。可以說，他剛到中國時，還是個外交新手；

離開中國時，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國際問題觀察家和外交家。這一切為他成為一個有全球視野和國際影響力的總統打下基礎。中國日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布什後來擔任總統時的政策、他的思維方式和政治手腕，有利於公眾更好地認識他擔任總統時應對重大國際危機的策略和手段。本書自2008年夏出版以來，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

從社會文化角度解讀民國政治

● 王龍飛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繼《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2003）、《中國近代通史》第七卷《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2006）之後，王奇生於2010年再推出一部民國史研究新作《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以下簡稱《革命與反革命》，引用只註頁碼）。正如副標題所示，本書以社會文化為觀照角度，落腳點為民國政治，其時間上限為新文化運動，標誌性事件是《新青年》的創刊，下限至1949年國共政權交替。

民國時期，「革命」與「反革命」的不確定性反映了當時各政治團體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和規劃的不同考慮，也體現出幾種政治勢力關於社會主導權的激烈爭奪。

王奇生以「革命與反革命」為標題，可謂以高度簡約的方式提煉出